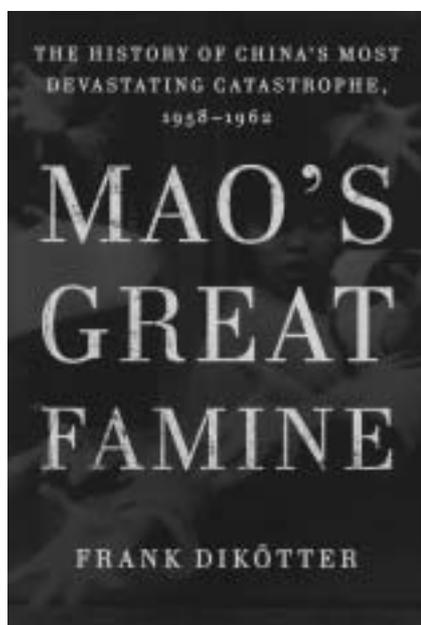


歷史檔案中的「毛時代」

● 董國強

馮客說，他在書中所用的檔案資料比楊繼繩的《墓碑》更多、更權威。馮客作為一個「老外」，誇口說能查看更多、更權威的檔案資料，在檔案制度壁壘森嚴的中國怎麼可能？然而這部新著證明，馮客當時所說並非虛言。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ter & Co., 2010).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時間裏，一些對中國改革開放心存疑慮的海內外「新左派」總是喜歡拿「毛時代」說事。筆者推介馮客 (Frank Dikötter) 的這本新書《毛製造的大饑荒：中

國最大災難的故事》(*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引用只註頁碼)，可能是一劑治療「新左派」歇斯底里症的良藥。

馮客原是英國倫敦大學的中國近現代史教授，幾年前跳槽到香港大學擔任人文學院首席教授。對筆者而言，他的傳奇是不到五十歲就出版了七本史學專著，內容涵蓋晚清、民國與共和國時代。像他這樣的學術「快槍手」，在筆者認識的西方學者中實屬罕見。2009年夏末，他到南京來查閱省、市檔案館的資料。筆者為他開了一份單位介紹信，並請他在校門口的一個小飯店裏吃了一頓晚飯。於是我們變成了朋友。

在閒聊中，馮客說他即將完成一部關於「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書稿。筆者隨即提到楊繼繩的新書《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馮客說，他在書中所用的檔案資料比楊更多、更權威。筆者當時心裏不免有點嘀咕：楊退休前是新華社資深記者，在全國各地擁有的廣泛人脈顯然非一般

研究者可比；你馮客作為一個「老外」，誇口說能看到更多、更權威的檔案資料，在檔案制度壁壘森嚴的中國，這怎麼可能？而且楊繼繩的《墓碑》上、下兩大冊，字數近百萬，涉及到「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方方面面，你馮客在此基礎上能玩出甚麼新花樣，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然而這部新著證明，馮客當時所說並非虛言。

從篇幅上看，馮著約420頁，比起楊繼繩的皇皇巨著顯然單薄許多。這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造成的：

第一，楊著除了利用檔案資料外，還大量運用了報刊資料、回憶錄資料、訪談資料和其他一些現有中文研究成果；而馮著除了在開頭幾章介紹歷史背景時運用了一些中英文二手資料外，主要依據檔案資料——其中包括北京外交部解密檔案，雲南、貴州、四川、甘肅、河北、河南、湖北、山東、浙江、廣東十省檔案館開放檔案，以及許多地方的地、市、縣檔案館館藏檔案。

第二，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楊繼繩似乎更注重歷史細節的鋪陳與渲染；而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馮客似乎更注重對歷史事實的提煉與整體性解釋。因而在處理史料時，楊著往往大段大段地加以摘引，而馮著則萃取史料中的基本事實和重要數據。

第三，楊著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分別敘述河南、甘肅、四川、安徽、吉林、江蘇、廣東、山東、浙江、雲南、河北、貴州等省的情況，下篇試圖進行一些整體性的分

析論述，因而內容上不免有許多交叉重疊的地方；而馮著則分「尋找烏托邦」、「穿越死亡之谷」、「大破壞」、「苟且偷生」、「弱勢群體」、「死亡方式」等幾個專題進行探討，全書論述線索比較連貫，內容分工比較明確，交叉重疊的內容很少。

從具體內容看，馮著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於作者對中外歷史上的一些同類事物有比較深入細緻的了解。該書對大躍進的社會動員方式與過程的闡釋，往往以帝國時代的中國、波爾布特 (Pol Pot) 時期的柬埔寨、希特勒時期的德國和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為參照；對大饑荒慘狀的描述，往往以近代歐洲國家如愛爾蘭、荷蘭等的情況為參照；對當時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生存技巧和道德扭曲問題的討論，往往以納粹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情況為參照。這種比較視野無疑為馮著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理論維度。

概要地說，在楊著就事論事的敘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大幫耽於理想的領導幹部「好心辦壞事」，間或夾雜着一些個人野心和私心，「唯上是從」，結果置億萬民眾於水火之中。而在馮著提供的比較視野中，我們看到的是制度框架下的階級對壘與利益衝突：一方面是由毛和各級黨政幹部構成的強大的威權政府，另一方面是數以億萬計的任人宰割的普通民眾。之所以會發生數千萬民眾生靈塗炭的慘劇，是因為當時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零和博弈。

關於大躍進運動的原始動力，馮客主要歸因於中蘇兩黨最高領導人的強烈競爭意識。這種解釋雖然

馮著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於作者對中外歷史上的一些同類事物有比較深入細緻的了解。這種比較視野無疑為馮著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理論維度。在其比較視野中，我們看到的是制度框架下的階級對壘與利益衝突。

正是出於對毛時代政治關係本質的深刻認知，馮客在書中首次將1958至1962年間「死於幹部暴行的人」作為一個特定的範疇，與一般意義上「死於饑荒的人」加以區別，進一步明確了「有組織的暴力」在維繫威權政治秩序中的決定性作用。

略顯單薄，但馮著對毛澤東複雜個性的描畫確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說毛提出「十五年趕超英美」的口號是基於他對外部時事和西方文明的懵懂無知，如果說他主張「糧食多了大家可以一天吃五頓」還可以被理解為中國農民式的質樸與天真，那麼在國內餓殍遍野時拒絕採取補救措施，還主動提出提前償還蘇聯債務，甚至將計劃進口的救命糧中途轉駁到其他亞非拉「兄弟國家」，則顯示出他對國計民生的漠不關心。他不惜「打腫臉充胖子」，將個人虛榮置於千千萬萬的國人性命之上，最終釀成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災難（頁14、41、105-106、112-14）。這顯然不是「好心辦壞事」的解釋體系可以涵蓋的。

其次，大躍進期間的動員和大饑荒期間的「維穩」，都離不開各級黨政幹部。在討論幹部群體的種種令人髮指的行為時，馮客當然也意識到來自上面的壓力。但他的分析並不到此為止。馮著提供的大量材料顯示，「上級壓力」能夠發生效力的根本原因，是各級幹部的功利主義和利己主義考量。他們為甚麼要千方百計地保住現有職位並進而求得升遷？這絕不是抽象的「政治覺悟」和「階級感情」可以解釋的。事實上，在當時的體制下，幹部職位與政治特權和物質享受是三位一體的。社會物質資源愈是匱乏，幹部的特權地位就愈是顯得重要。所以，各級幹部的群體性的一致反應，最終還是應歸結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根本利益衝突。

再者，如果說大躍進期間各地大規模興修水利還可以被解釋為政

府對民生的關注，那麼在饑荒初現的1959年，北京及全國各地出現大量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則無一不直觀地反映了黨與群眾的對立。正是出於對毛時代政治關係本質的深刻認知，馮客在書中首次將1958至1962年間「死於幹部暴行的人」作為一個特定的範疇，與一般意義上「死於饑荒的人」加以區別，進一步明確了「有組織的暴力」在維繫威權政治秩序中的決定性作用（頁292-301、318-19）。

馮著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在於通過深入細緻的分析論述，揭露了「計劃經濟」（有時被直接稱為「命令經濟」）的原罪。作者不但注意到所謂「公有制」產權虛置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如各種生產工具使用壽命極大縮短的量化分析，如工業產品在製造、運輸、儲存、調配過程中巨大損耗的量化分析，等等），而且指出用行政命令方式處理經濟事務必然造成種種嚴重後果。例如，當時中國為了搶佔市場份額和爭取外匯，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傾銷輕工產品，結果造成相關企業再生產難以為繼；再例如，當時屢禁不止的計劃配給票券的貨幣化現象和通脹危機中的市場搶購行為等，無一不頑強地顯示出經濟規律自身的內在張力，不斷從內部解構着所謂「計劃經濟」。另一方面，一些與「計劃經濟」概念相生相伴的特有經濟現象——無論是貌似非法的「投機倒把」行為，還是貌似合法的「單位採購員」制度——無疑都孕育着制度性的腐敗。

由該書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所謂「命令經濟」與「集權政治」是一

對學生兄弟。「命令經濟」往往表現為執政者的主觀意願與客觀事實的相互悖離，表現為政治權力對經濟規律的驕橫與僭越。這種畸形的混合體制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往往與執政者的主觀願望背道而馳：大躍進期間倉促上馬的許多大型水利工程，有些因財力物力不足半途而廢；有些因嚴重違背自然規律引發更多的旱澇、鹽鹼災害；有些則成為「定時炸彈」遺患於後，都是很好的例證。

馮著的第三個重要特點，在於通過檔案材料展現當時社會生活的多重面相。在「大破壞」、「苟且偷生」、「弱勢群體」、「死亡方式」等幾個專題中，作者系統考察了1958至1962年間農民、工人和社會範疇不甚明晰的流動人口的日常生活。這樣，我們不但對一些耳熟能詳的高層精英人物（如統領全局的毛澤東，如主管中央計劃工作的周恩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如各省主要領導人謝富治、張仲良、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舒同、王任重、陶鑄、趙紫陽等）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有機會認識許多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民眾。我們不但知道了當時的政府決策過程，而且有機會深入了解一般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種種實際反應。

該書揭示的一個重要真相是：與人們慣有的非此即彼式的主觀臆測不同，那個時代廣大普通民眾對政府各項政策既不絕對服從，也不公開對抗，而是生活在一種難以名狀的灰色精神狀態中。換言之，在

殘酷的政治高壓和嚴重的物質匱乏條件下，人們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依賴一些應對的技巧——如逢迎、撒謊、欺詐、偷盜、走私、怠工等等。馮著由此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毛時代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徵之一是相互忽悠與敷衍：一方面，毛澤東用烏托邦理想和道德說教忽悠廣大幹部群眾；另一方面，廣大幹部群眾用各種假新聞、假報告敷衍毛澤東和中央。

不過在展現社會日常生活時，馮著依然使我們看到一些表面相似的行為背後的不同含義，進而看到社會的分化與對立：例如同樣是大吃大喝，表現在幹部群體身上是特權與腐敗，表現在普通群眾身上則是無奈和絕望；同樣是不關心生產，表現在幹部群體身上是「政治掛帥」，表現在普通群眾身上則是消極抵抗；同樣是仗人致死，表現在幹部群體身上是權威的體現與宣洩，表現在普通群眾身上則是對幹部淫威的畏懼與屈從。由此可見，大躍進和大饑荒的危害，並不僅僅局限於有形的人口與財產的損失，而且導致無形的道德觀念被扭曲和社會風氣敗壞，令社會前進動力被扼殺。

縱觀全書，筆者認為馮著的突出貢獻並不在於描述大躍進的癡狂、大饑荒的慘象和對具體的人口與財產損失的數據統計（在他提供的一系列數據中，有兩個特別值得注意：其一是在4,500萬的「非正常死亡」中，有近6至8%的人直接死於基層幹部的暴行〔頁298〕；其二是在很多地方，大約有近40%的農舍

該書揭示的一個重要真相是：那個時代廣大普通民眾對政府各項政策既不絕對服從，也不公開對抗，而是生活在一種難以名狀的灰色精神狀態中。毛時代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徵之一是相互忽悠與敷衍。

馮著的突出貢獻在於他用十分經濟的篇幅為我們揭示了以下悖論：一方面，當時的威權政府擁有空前絕後的強大動員能力；另一方面，這種動員能力的實際後果卻是破壞大於建設。

因為莫名其妙的「積肥」運動、因為興建公共食堂、因為「全民煉鋼」興建土高爐、因為興修各種水利工程和各種「形象工程」，而被強行拆毀，造成房主人流離失所，死於非命（頁169-70），而是在於他用十分經濟的篇幅為我們揭示了以下悖論：一方面，當時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集權體制內部到處充斥着混亂與漏洞，無時無刻不在蠶食着集權體制本身。一方面，當時的威權政府擁有空前絕後的強大動員能

力；另一方面，這種動員能力的實際後果卻是破壞大於建設。

筆者希望向學界同仁——尤其是一些「新左派」朋友——推薦馮客的這本新書，因為該書依據大量檔案文獻所提供的確鑿事實和數據，無情批駁了「威權政治可以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計劃經濟可以杜絕無序競爭造成的惡果」等謬論。如果說過去對毛時代的迷戀是源於我們的無知，那麼在知道了歷史真相以後，難道我們不應該從思想上徹底告別那個時代嗎？

認同：個體、社會與普世

● 呂文江



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 著，呂文江、田嵩燕譯：《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1950年代之後，心理史學在美國蓬勃興起，其中執牛耳者是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再傳弟子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1969年，埃里克森發表心理史學專著《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Gandhi's Truth: 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